

第九章、結論

唐代敘事文學，作品數量大大增加，而且形式也多種多樣。至唐代，不管民間或文人，都獲得相當高的敘事藝術成就。唐代敘事文學為後代敘事文學發展提供了不少模範，具體地說，它把自己的種種藝術成就提供給後代小說與戲劇。

唐代敘事文學的發展也關聯於社會、經濟、文化。繁榮的經濟為唐代文化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。物質生產逾豐富，休閒時間逾增加，因此，從事文化生產與享受文化的人口也增加。唐代敘事文學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發展。市場的繁榮、休閒時間的增加、印刷術的進步等，社會經濟的條件促進敘事文學的增加。

在思想方面，唐朝的統治者對於儒、佛、道三教，都可以利用，這種政策在唐初已得到確立，以後大體上不改變。唐代三教調和的論調雖然很盛，但三教之間在理論、教義上有不少地方相互抵觸，因此，它們之間的矛盾衝突又相當激烈。三教的衝突表示人們可以自由討論三教，包含著三教的交流和融合。因此，社會思想從一個宗教的束縛得到了解放，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保證思想的自由。文學創作也隨之得到思想自由的機會，無論民間或文人，都堅持較為開放的態度，創作出各自的敘事文學。

佛教初傳到中國時，知識分子也難以理解這深奧的思辨哲學，他們以道教的理論來理解佛教而解釋佛經，所以佛道思想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。中國人堅持自己的經過主體性而接受此外來宗教，因此產生了中國化的佛教。儒教成為人民的生活倫理，佛教和道教在精神方面上把文學的想像提供給人民，這是唐代文化的特點，它表現於唐代文學作品上。唐代的目連故事採取佛經的母題，

發揮虛構想像力而加工再創作。其再創作的特點在於，加深了目連故事的世俗化色彩，也突出中國化的色彩，貼近一般民眾，因此深受民眾的歡迎。

唐代的城市無論在規模和布局上，都有了巨大的發展，並大大超過了以前任何朝代，如唐都長安，當時已成爲世界最大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，已成爲亞洲著名的國際大都市。以前的城市生活，只是城市貴族生活而已。至於城市平民的生活，則與農村生活相差不遠。商品市場的繁榮，促使了商業向近代型轉化，這是中國商業從隋唐開始的重要變化。在一個正常發展的城市中，商業貿易功能是它所具備的重要功能。閑逸、安適和享樂，這是都市人所追求的目標。在中國古代城市中，有三種消費階層：統治階級、貴族及其家屬；商人、手工業者及其家屬；從事服務性行業的經營者及其家屬。這三個階層構成了城市中三個主要消費群體。同時，也正由於這三種人消費層次不同，他們對娛樂的追求也不一樣。文學擔當這種娛樂的功能，民間故事是民眾的娛樂，傳奇是文人的娛樂。

敦煌講唱和傳奇是一種文學體裁，都屬於敘事文學。敘事樣式是人類的普遍樣式。敘事文學的出發點在於故事，人類喜歡聽別人講述的故事，人類爲了充足對未知世界的好奇感，喜歡聽自己未所聽的故事，經過想像而擴大自己的經驗。人們多聽各種故事，其虛構意識飛越，這樣，創作出新鮮的故事。創作與鑑賞之間有這種互補的關係。

一般來講，人們要聽有興趣的故事，這種興趣在敘事文學上是必需的。唐代以前，文學的教化功能被重視，至於唐代，不管文學的娛樂功能被重視或者被忽視，民眾和文人都要求具有娛樂功能的文學。韓愈創作了〈毛穎傳〉之類的虛構敘事，因此引起同時代文人的批判。從中看出唐代文人之間對虛構敘事有不同的接受態度，但是一批文人不但認識虛構的本質，同時肯定它的價值。這種意識爲唐代敘事文學的發展立下了某種理論基礎。

唐代實施科舉制度，出現了新興社會階層。在所有科目中，考進士科難度最大，往往是百人中取一、二名，故唐代進士科特別受到士人的重視。唐代的舉人在考試前後都長期集中在長安，一邊準備科舉考試，一邊參與各種活動。其活動的中心內容是擴大名聲及交遊，爲了達到這一目的，同時也爲了消遣娛樂，他們經常參加各種大小宴會。其中，嫖妓是他們的嗜好活動之一，也是傳奇的主題之一。文人都熟知娼妓的生活，因此他們把人物形象化得具體生動，也把唐代社會的特定環境表現出來，情節的曲折也合情合理。唐代城市商業的發展爲文人的遊宴提供了經濟的條件。他們在遣興娛樂方面也需要傳奇。

講唱樣式的歷史悠久，到唐代更加發展。唐代開始有了較爲固定的演出場所和固定的演出時間，可以招徠聽衆，出現了以演出謀生的專門藝人，服務於爲了娛樂消遣而來觀看的聽衆，它就成爲鄉鎮居民的大衆娛樂，有了不少可供演唱使用的說唱底本，這種底本不是爲閱讀而編寫，主要是對民衆演出而編寫。講唱的主要對象是一般民衆，尤其是沒有文化或文化水準較低的民衆。其形式採用大衆喜聞樂見、生動活潑的說唱樣式，互動聽衆感情。變文的文本不是固定的實體，講唱者和聽衆之間的感情相應非常重要，一場演出隨著當時的情況流動創造。

所有的文學類型反映著產生它的獨特文化的結構。它們不能還原特定的形式，所以不能作盲目的類型化。對故事情節的展開方式，各種敘事技巧等，先要考慮各國的文化傳統及特殊性，然後探討敘事文學的結構。無論民間故事或文人傳奇，有關自己生活的故事都有共同結構，其結構反映各自的現實生活。筆者在上一節中探討了其共同敘事結構。

中國敘事文學不斷地批判既存的樣式，在這種過程中，修改自己的樣式。講唱的口頭樣式與閱讀的書面樣式都根據講唱者(作者)和聽衆(讀者)之間的文化背景，使故事內容豐富生動。他們都發揮各自文學存在樣式(口頭與書面)的

特點，獲得藝術成就。

某個故事的母題在唐代非常廣泛流行，流行於整個社會的階層。民間流行的說唱文學給文人創作傳奇提供了一些題材。〈李娃傳〉以民間文學〈一枝花〉為基礎，白行簡加工而創作的，但是仍然具有文人文學的特點。說唱文學是散韻結合的體裁，對傳奇小說的結構形式也不無影響，因此，唐代傳奇和敘事歌行採用同一題材創作而相互配合。民間與文人之間互相有交流，但是堅持自己的主體意識而吸取對方文學的優點。

筆者認為民間文學和文人文學的交流不是單一方面的，不管民衆或文人，唐代的整體社會成員都可以享受多元化的文化產品。唐詩達到極高的成就，一般民衆也享受文人創作的詩。白居易在〈與元九書〉中表示這種現象：「自長安抵江西，三四千里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中，往往有題僕詩者，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，每每有詠僕詩者。」¹民衆享受文人文學而提高民間文學的水準，民衆提高的文學享受能力向創作者要求較高的水準。民間文學吸取文人文學的成就，而且提高民間文學的標準。文人文學也吸取民間文學的成就，而且積極地利用於自己的創作，繼承民間文學而發展文人文學。兩者之間的交流創造了整體的唐代敘事文學。

¹ 〔唐〕白居易，顧學頡校點，〈白居易集（第三冊）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），頁963。